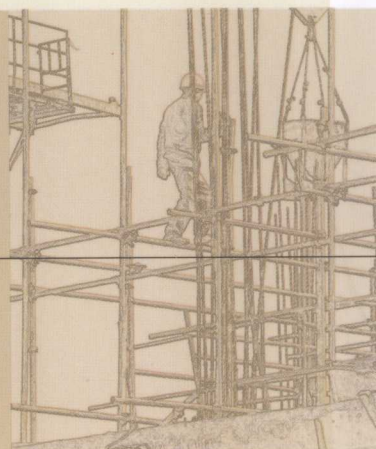


农民工权益保护： 多元路径与本土经验

NONGMINGONG QUANYI BAOHU:
DUOYUAN LUJING YU BENTU JINGYAN

◎ 黄岩 /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11BSH053)

农民工权益保护：多元 路径与本土经验

黄 岩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民工权益保护：多元路径与本土经验/黄岩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141-7013-9

I. ①农… II. ①黄… III. ①农民-劳动就业-
劳动法-研究-中国 IV. ①D922.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6439 号

责任编辑：李 雪 张庆杰
责任校对：郑淑艳
责任印制：邱 天

农民工权益保护：多元路径与本土经验

黄 岩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010-88191217 发行部电话：010-88191522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1000 16 开 11 印张 200000 字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41-7013-9 定价：3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88191586)

电子邮箱：dbts@esp.com.cn)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全球化、跨国资本与劳动政策的挑战	1
第二节 研究框架	7
第二章 生产守则：从内部监管到外部约束	10
第一节 生产守则运动的兴起	10
第二节 生产守则的类型	13
第三节 EICC 生产守则	19
第三章 点名和羞辱：社会认证和私有化监管模式	26
第一节 社会认证和私有化监管模式的兴起背景	26
第二节 社会认证和私有化监管模式的理论解释	28
第三节 公平劳动协会和大学师生监督无良企业行动	34
第四节 社会认证和私有化监管模式的前景展望	36
第四章 审核和查厂：苹果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38
第一节 社会认证的争议：道德自律还是公关游戏	38
第二节 苹果公司内部审核：供应链的约束	43
第三节 谁来监管品牌：对苹果公司的质疑	51

第四节 认证监管：政策工具创新	54
第五章 跨国倡议网络：回飞镖行动策略	61
第一节 介入中国劳动保护的跨国倡议网络	62
第二节 中国劳工透视：不要血汗珠宝运动	64
第三节 跨国倡议网络行动策略	67
第四节 多向度复合型回飞镖模式	73
第六章 倡导与孵化：农民工组织的混合策略	81
第一节 组织化倡导者及其孵化器	81
第二节 迈向工业公民权：农民工组织的行动方式	90
第三节 从排斥到融合：农民工组织的未来目标	96
第七章 激活稻草人：东莞裕元罢工中的工会转型	100
第一节 裕元罢工与稻草人工会	100
第二节 裕元罢工事件的过程	103
第三节 激活稻草人：工会工作组主动介入	110
第四节 裕元事件的工会转型启示	120
第八章 工会网络问“政”：“工人在线”创新维权新机制	124
第一节 工会如何接地气	124
第二节 “工人在线”搭建网络问政平台	125
第三节 “工人在线”问政特点	129
第四节 问政与问责：“工人在线”效果和限度	132
第九章 流动人员积分制管理模式：广东省中山市的探索	135
第一节 积分制的实施背景	135
第二节 积分制的具体内容	136

第三节 积分制的运作特点	139
第四节 积分制的融合功能	143
第十章 结论与讨论	146
参考文献	152
后记	165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全球化、跨国资本与劳动政策的挑战

工人权利是当前全球性的学术和政策辩论的中心议题。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蔓延全世界，各国政府、学者和工会活动家越来越关心全球化进程对工人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影响，从中国的沿海地区电子产业到中美洲诸国的服装制造业再到巴基斯坦的足球缝制工厂，全球生产体系中劳动条件的恶化已经使得血汗工厂成为学术和政策讨论的激烈议题。过去的 30 年，经济的全球化和出口导向的产业发展也使得中国工人权利保护问题成为学术和政策辩论的焦点。从性别歧视、强迫加班、最低工资标准再到童工保护、职业病等等，关于中国血汗工厂议题报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媒体上。2010 年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 17 起工人连环自杀案；同期，广东南海本田汽车工人发起停工导致本田在中国境内的其他组装工厂全面停产，本田停工事件继而引发了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地区其他汽配生产企业的连锁工潮，2014 年全球最大鞋业代工企业广东东莞裕元鞋厂发生 4 万工人长达 13 天的停工事件，这些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始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信息技术带来了新一轮的组织制度和生产形态的变革，传统的福特制生产模式被替代，一种更为灵活和适应复杂竞争环境的生产体系正在逐步形成，“精益生产”、“后福特主义”、“大规模定制”、“后现代管理”等生产领域的变化被英国著名左翼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 1989）归纳为“资本的弹性积累”。戴维·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特征与其说是劳工市场全面成为灵活具有弹性的市场，不如说是货币资本脱离了物质生产循环领域实现了空前的自主权（即金融资本的无限膨胀）。因此，戴维·哈维（2006）进一步指出，“全球化可以被视作一个过程，一项条件或者一个特定的政治规划”。维尔·多斯（2008）总结了影响全球化的三个重要事件：一是由于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化，特别是通信信息技术的变革；二是经济关系国际化加速了资本和商品的快速流动；三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挫折。生产分散化、企业外迁、劳动市场的非正规化、就业的不稳定性这些生产领域的变化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关系。企业的收购合并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生产中心的生产体系。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全球 80% 的产品制造是在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供应商和次级承包合同网络中完成的。

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凭借其轻盈的流动性突破了生产空间的制约，实现了与劳动力的分离。鲍曼（2006）认为：“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像劳动力一样固定在那个领域。现在，仅仅通过一个只包括公文包、移动电话和笔记本电脑的行李箱，资本就能轻松地传动。它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作短暂停留，只要自己不满意，它在任何地方都不需要待得太久。另一方面，劳动力依然像它过去那样纹丝不动。”资本和产业分工在全球流动的同时加剧了劳动力对资本的依赖，强化了资方对劳方的控制。发达国家凭借发达的技术站在整个生产链的最高端，承担品牌公司的运营和管理，负责产品的设计与销售，赚取整个价值链中的最大利润；同时，他们也在寻求最低生产成本的制造商，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以廉价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争抢”供应链的最低端——生产制造，仅仅分得整个价值链中的最小利润。为了获得跨国公司的大量订单，发展中

国家不惜压低成本，降低工人经济待遇，把对工人利益的剥削程度作为国家间争抢订单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凭借品牌的强大力量不断地转移生产订单，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的生产商和供应商，以廉价劳动力作为自己比较优势的中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潮中不得不陷入一场“逐底竞争”（race to bottom）之中。“跨国公司的这种经营方式要求以一种全球性社区视角去探讨劳工问题解决方案”（佟新，2005）。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消费者驱动的商品链催生了沃尔玛和家乐福这些超级零售商的崛起。全球40家零售巨头2001年收入约103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球GDP的1/3，其中沃尔玛的销售额约占零售商销售总额的1/5。跨国零售巨头的支配地位对工人权益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因为消费者驱动的商品链具有后福特主义生产的特点，拥有全球外购网络和资金的高度流动性。零售商对于品牌商和制造商具有过度的控制力（Richard Appelbaum，2005），这些超级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任何地方下达订单，他们的承包商被看成是相对劣势的代工者，而不是平等的合作伙伴。

日益壮大的全球化力量对劳动体制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由于资本全球流动而形成一个全球性生产网络，跨国资本不断地转移，制造产业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弱化了国家的力量，出现前所未有的全球无产阶级化。对工人的影响主要是工人的流动性与资本的流动性不对等，资本可以通过不断的流动来寻找最便宜的劳动力，但工人的流动受制于各种因素，在中国，工人跨省之间的流动都要受制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工人权益向下竞争，地方政府通过降低劳工保护条件来吸引外来资本。传统以工会为基础的工人动员陷入困境，因为跨国的工会团结不可能出现（余晓敏，2006）。就工人政治而言，左翼学者德里克（1998）在哈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技术赋予资本和生产以空前的流动性，因而生产的定位似乎处于一种永恒不断的流动状态，弹性生产加快了资本生产的全球化和权力控制，这场新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一场开创新纪元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从政治上重新组织的革命，其目的是让全球资本主义摆脱各种政治羁绊放手统治全世界。当然，这种全球化带来的资本跨国流动从积极意义上来说也促

进了国际社会的合作，如世界主义民主、工会国际主义等概念开始引入。在弹性生产方式的作用下，资本主义通过分散劳动力市场、劳动过程和消费市场，从而在全球形成了地理上流动且回应更加灵活和紧密的跨国行为体。全球化对劳动体制的影响还表现为金融资本在国际间的快速流通导致许多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无法继续维持，不仅发达国家内部的劳资之间的权力关系受到挑战，而且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寻找最廉价的劳动力，而工人本身无法随资本而流动，工人的工作机会更缺乏保障。

国际代工生产模式把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形成新的生产网络，中国沿海地区在这一背景下兴起了大量工业园、出口加工区。数亿农民为了摆脱贫困，从农村来到城市寻求就业机会，成为工业区内的主要劳动力。全球化使劳动市场的弹性增大，订单转移不仅降低了跨国公司的生产风险和管理风险，劳资关系冲突也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工厂内。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榨取剩余价值的种种手段和方法又被重新利用，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工资过低、无薪酬加班等非法行为在中国沿海地区催生出许多“血汗工厂”。政府、工会、工人三方解决劳资关系的传统格局被打破，非政府组织、消费者运动组织、跨国公司、媒体陆续参与其中，这些基于共同道德理念或价值观的非国家行为体通过交流与合作凝聚在一起，构成“跨国倡议网络”（玛格丽特·E·凯克和凯瑟琳·辛金克，2005）。他们以国际劳工标准为依托，在中国沿海地区开展工人权益保护活动，逐渐发展出一条中国工人权益保护的新路径。

跨国公司通过代工订单把中国工人带进了全球化的热浪中，支持者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有助于工人权益的进步，艾特肯（Aitken, Brian, Ann Harrison and Robert Lipsey, 1996）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在第三世界的跨国公司要比国内公司支付更高的工资。芬斯特拉和汉森（Feenstra, Robert and Gordon Hanson, 1997）认为跨国公司通过增加对劳工的需求来改善工人的生活。巴德等学者（Budd, John, Jozef Konings and Matthew Slaughter, 2002）认为，随着利润的上升，跨国公司

将与第三世界的工人一起分享收益，因而反对血汗工厂将会减少这一地区的就业与投资。也有学者认为代工企业从跨国公司手中拿到订单，承担的是分包商的角色，而血汗故事正是发生在这些分包商身上（Miller John, 2003）。冷战结束后，国际劳工运动中意识形态的对立性逐渐消除，全球化使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的工人都卷入跨国资本的控制中，跨国公司力量的增强也意味着各国政府通过国内的劳工立法已经难以充分保护本国劳工的利益，不同国家的工人彼此竞争廉价工作岗位，跨国公司通过外包等方式将工作机会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更落后的国家。当工厂被分散到全球各地时，发达国家的劳工法律不可能在其他国家执行，而工会组织要将其活动扩展到跨区域或全球联盟也非常困难，因为工会首先要保护的是本地会员利益，避免本地工人的工作机会转移到低工资地区。一些学者对超国家的劳动监察机制表示怀疑，如理查德（Richard Appelbaum, 2005）认为具有国际约束力（和可实施的）的劳工法律根本不存在，隶属于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在工人、雇主和政府三者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运作，但与其他国际组织类似的是，国际劳工组织缺乏执行权力。国际劳工组织已经制订了180多条管理工作条件的公约，可是这些公约必须经过成员国批准才能正式生效，即便这些公约生效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吊诡的是，美国仅仅批准了13条劳动公约。目前唯一一个能够执行有关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只有世界贸易组织（WTO），然而WTO的强制力量不能够用在执行劳工标准上。

在市场机制发达的西方国家，劳动管理的主要途径是工人通过工会与资方的谈判来实现，国家负责保障工会与雇主平等协商并规范劳动争议程序。著名劳工社会学家布若威（2008：113）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美国制造业劳动现场观察后认为：“公司在它们自身的权限范围内以集体讨价还价和申诉机制的形式确立政治过程，以此来设法为它们诸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布若威把这种生产体制称为“内部国家”。他强调，内部国家从专制形式过渡到霸权形式依赖于工人代表在政府中的有限参与，工会要从其成员那里获得忠诚，必须足够强壮并能积极回应工

人，但其能力不足以挑战资方在组织与控制劳动过程中的特权。尽管工人对工会的支持更强有力了，但工会对资方的挑战更微弱了。全球化对于工会运动的冲击在于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导致不同国家对工作机会的竞争加剧了，30年后，《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再版，布若威为此专门写下著名的序言《又一个30年》，他坦言没有预料到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工会的衰退和生产霸权政体的衰退，因为市场和国家的变化以及加诸于工人的强制性压力所催生的霸权政体削弱了工人对资方的对抗能力。

在中国，劳动管理主要由国家（政府）通过规范劳动法律来实现，工人与资方的劳动争议必须在国家法律框架下通过调解、仲裁和诉讼程序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工人代表的工会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尽管国际劳工组织1948年的《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公约》（第87号公约）和1949年的《组织权和集体谈判权公约》（第98号公约）规定了工人结社自由，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劳动法》第七条、《工会法》第二条和第三条、《外资企业法》第十三条具体规定了工人的结社权，但中国实行单一工会制，这些法律条款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受到诸多限制和变通。

中国的劳动管理政策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转变，国家一方面不断地完善劳动法规以适应资本跨国界流动和品牌跨国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国家又要维护工人正当权益和应对跨国工人运动的扩散。本书将聚焦于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关系，观察全球化对中国劳动管理和产业关系产生的冲击。与国家立法、工会保护等传统劳动管理体制不同的是，自愿劳动体制或私有化体制以及劳工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壮大都被看做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反血汗工厂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血汗工厂运动正在改变中国的劳动关系，同时也在多个领域挑战中国传统的劳动管理模式。中国传统的国家组合主义保护和超越国家的国际工人团结受到挑战，日益活跃的跨国工人倡议组织以自愿劳动标准和劳动监察等形式把中国工人权益保护推向一个新阶段，它同时有助于我们理解转型时期的中国工人政治，跨国倡议网络必须同时面对宏观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地方政治结构以及变动中的资本力量

等诸多复杂的环境。

全球反血汗工厂运动是在资本、品牌、信息、交通等高度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工人权益保护的第三条道路，它改变了传统劳资关系中的“资本—国家—工会”和“工人—雇主—工会”的所谓大三方和小三方保护模式，反血汗工厂运动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生产商如富士康公司、品牌商如苹果公司、零售商如沃尔玛等跨国公司，通过媒体压力和消费者压力，要求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劳工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此褒贬不一。本书需要论述的是，中国劳动关系面临着激烈的转型，传统的国家主义保护模式受到严重挑战，各种不同性质的用工体系挑战了劳工保护的传统模式，劳动政策和工人权益保护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本书将集中描述和分析日益兴盛的反血汗工厂运动在中国的活动情况，探索中国的劳动政策应该如何迎接这些挑战，中国各级政府应该如何借鉴和学习这些劳动保护的政策工具。

第二节 研究框架

自2004年开始，笔者开始研究中国的劳动政策，十多年来，一直在珠三角地区从事劳动政策和劳动关系的调研，主要的关注点是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在调研过程中，笔者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劳动关系已经深深地嵌入到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中，大量的制造企业密布在珠三角地区的各个村镇，这一地区已经聚合了数以千万计的外来农民工，他们的打工权益长期受到制度性的歧视。同时，打工收入又是中国内地无数个家庭的经济支撑，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出口导向产业还带动了中国制造产业的整体进步。农民工权益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关注热点问题，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界投入很多的研究资源对这一特殊现象进行研究。2006年，笔者在《开放时代》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外来工组织与跨国劳工团结网络》，这也是学术界比较早描述珠三角地区的农民

工组织问题的文章^①，其中也涉及跨国倡议对中国农民工团结的影响。2008年笔者在《社会》杂志上发表《代工产业的劳工团结》，描述和讨论珠三角地区一家鞋业代工企业在社会责任国际（SAI）的帮助下成立员工委员会，推动车间层面民主管理的故事。作为笔者研究农民工问题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这些文章最后也汇集在笔者2011年出版的《全球化与中国劳动政治的转型》一书中。从2011年开始，笔者系统地研究跨国倡议和社会认证在中国的现状，因为笔者认识到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农民工组织化以及基于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和认证压力已经形成了多重责任主体来推动农民工权益保护，学术界对这些多样化的力量研究还不多。2011年，笔者成功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反血汗工厂运动与中国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在学术界和劳工实践界来看，反血汗工厂运动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工人团结已经变得异常脆弱或无助时，非政府组织和私有化认证正在成为工人保护的重要力量。因此，笔者这个项目的主题将集中于跨国倡议力量在中国的行动，其中既有认证监管运动，也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而活跃在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组织几乎都受到跨国倡议力量的帮助和影响。

在具体的章节安排中，除第一章导论外，第二章“生产守则：从内部监管到外部约束”对生产守则运动的起源和历史进行了一个梳理，分析了生产守则的类型和作用，本章还介绍了电子行业生产守则，尽管生产守则在西方国家饱受批评，但我们认为在传统的国家保护政策薄弱的情况下，生产守则对中国的工人权益保护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第三章“点名和羞辱：社会认证和私有化监管模式”以两个私有化监管组织为个案，分析在市场和消费者品牌压力下的认证和监管力量在中国的前景。第四章“审核和查厂：苹果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以全球著名的苹果公司为例，讨论跨国品牌公司在消费者和品牌压力下改进供应链企业劳工权益的行为。尽管跨

^① 在后面的论述中，农民工组织有时也被称为农民工NGO、劳工组织、农民工草根组织等等。

国公司内部审核受到诸多质疑，我们认为苹果公司的社会责任审核行为有效地促进了代工企业的生产条件改进，促进了工人权益的进步。第五章“跨国倡议网络：回飞镖行动策略”借鉴凯克和辛金克的回飞镖理论，以中国劳工透视这家香港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为个案，展示跨国倡议网络介入中国工人权益保护领域的积极作用。第六章“倡导与孵化：农民工组织的混合策略”主要描述了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组织的成长和发展历程，着重分析农民工组织在促进公民权的实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活跃在广州和深圳的“打工族服务部”和“女性联网”这两家机构是珠三角农民工组织的先导者，他们发挥了倡导者和孵化器功能。最后三章主要介绍广东省近年来在维护农民工权益和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等方面的政策创新个案，第七章“激活稻草人：东莞裕元罢工中的工会转型”以东莞裕元停工事件为分析对象，广东省总工会坚持把维权作主业，在介入东莞裕元鞋厂罢工事件和畅通与工人联系过程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裕元事件最后得到圆满解决，工人的利益得到满足，裕元鞋厂也在事后完善了工会建制，建立起一个工人满意的工会。第八章“工会网络问‘政’：工人在线创新维权新机制”总结工人在线的作用，通过工人在线平台，广东省总工会及时了解工人的需求，帮助工人解决打工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并把网络问政功能不断地延伸。第九章系统地总结广东中山市探索出来的积分制入户和积分制入学的经验，积分制在中山成功运转多年后，现在广东省全面推广，这一政策得到了农民工高度认可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最后一章是一个简单的总结，笔者认为，跨国倡议网络、私有化监管、社会认证以及非政府组织在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对于农民工权益的改善有着非常巨大的价值，特别是在资本与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如此亲近的当下，我们应该肯定这些新兴力量的重要意义，广东省总工会和地方政府的角色转型非常值得全国其他地区借鉴和学习。

第二章

生产守则：从内部监管到 外部约束

生产守则是由跨国公司提倡的一种关于企业生产伦理标准的正式声明，跨国公司要求所有与其相关的贸易伙伴以及供货商都必须采纳这套标准。这些守则大多数都包含了企业必须遵守的劳动标准和环境标准，对于不遵守该生产守则的供货商或者承包商，跨国公司将取消与他们的订货合同。本章对生产守则的发展背景进行回顾，再分析生产守则的类型和生产守则的监管特点。

第一节 生产守则运动的兴起

一、“沙利文原则” (Sullivan Principles)

自 1948 年开始，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以合法的形式持续存在，1962 年联合国呼吁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但没有得到西方主要国家的响应，随后美国的反种族歧视倡议者成立了“关于公司责任的跨宗教信仰中心” (Interfaith Center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该组织行动的主要纲领就是

沙利文原则（Sullivan Principles）。沙利文原则是由非洲裔美国传教士里昂·沙利文（Leon Sullivan）于1977年创建的，当时沙利文是美国通用汽车的董事会成员，而通用公司又是当时美国在南非雇用黑人最多的企业。沙利文原则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企业要保证做到不同肤色的工人都必须得到平等的待遇，资方不得设立歧视性隔离区，这些规定挑战了南非当时的种族隔离政策。沙利文原则得到了来自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30多所美国大学的支持，沙利文原则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融入其经济利润追求之中，企业不仅要追求的经济价值还要追求社会责任。1999年，沙利文提出了沙利文全球原则（The Global Sullivan Principles），并由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宣布在全球推广，该原则要求跨国公司重视劳工、人权和环境保护从而减轻全球化进程带来的负面影响。沙利文全球原则主要包含尊重人权、支持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禁用童工、反对强迫劳动、消除工作场所歧视、重视环境保护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目前全世界各地有30多个国家的200多家公司都已采纳和遵守沙利文全球原则，包括雅芳（Avon）、宝洁（P&G）、壳牌（Shell）和可口可乐（Coca-Cola）等著名跨国公司。沙利文全球原则也吸引了不少中小型企业 and 大学参加，每个签约的机构都要提交一份年度审核报告，涉及机构本年度对守则的执行情况。

二、跨国公司生产丑闻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同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各种生产要素打破了国家间地域的限制并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试图逃避本国法律以及资本流入国法律的监管，针对跨国公司和跨国品牌的批评和揭露行动开始出现，媒体和公众希望跨国公司约束自己的供应链企业，杜绝血汗工厂现象出现，承担社会责任。

反血汗工厂运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几件重大的丑闻及